

目 录

回顾工作团在兴仁见闻·····	夏德义 (1)
忆在兴仁专区率部起义·····	<u>王伯勋</u> 王贵屏 (9)
回忆谭本良起义事略·····	谭百周 (14)
回忆兴仁地区起义前后的概况·····	周紹宗 (25)
四十九师在兴仁简况·····	张心田 (30)
泗源乡工作组在土匪攻城的前后·····	吴念孔 (33)
守卫兴仁城防的八连·····	龙树德 方良珪 (41)
记反封建斗争运动情况的概述·····	謝明权 (45)
在格沙屯剿匪的回忆·····	柴汝景 (49)
围剿匪首岑育弟、岑育甫的经过·····	李 明 (51)
土改生活散记·····	李瑞章 (55)
忆城关区组织及工作概况·····	李兴国 (60)
记大山区解放初二三事·····	謝明权 (67)
《兴仁县报》的开办情况·····	謝明权 (67)
小资料简介·····	李瑞章 (70)
解放后中学教育与卫生状况点滴·····	謝明权 (73)
烈士陵园修建概况·····	赵国忠 謝明权 (75)
解放兴仁革命烈士英名录·····	文史办整理 (77)
忆黔第三行政区防空指挥部暨	
兴仁防空情报分所·····	雷 銘 (82)

兴仁陆关飞机场修建始末·····	謝明权 (87)
兴仁大操场兴建今昔·····	顏生慎 (91)
抗日时期大事记点滴·····	顏生慎 (94)
记台儿庄抗日陣亡將士龙云阶·····	謝明权 (96)
美军火箭炮演习场一瞥·····	吳亚威 (98)
回忆父亲·····	王履岳 王履岱 (99)
周县尧传略·····	謝明权 (103)
一位救死扶伤的政协委员	
——记吳性初医生事略·····	顏生慎 (105)
兴仁柑桔生产发展的历史状况·····	謝明权 (107)
利用山区资源酿酒侧记·····	顏生慎 (110)
封面题词·····	孔政祥

回顾工作团在兴仁见闻

夏 德 义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解放了贵阳市后，国民党十九兵团和保安部队三个师共一万五千多人被压缩在黔西南地区，完全处于我人民解放军包围之中。迫于这种形势，十九兵团代总司令王伯勋、八十九军军长张涛、四十九军军长王景渊，于十二月十日在普安通电起义。过了两天，原兴仁专署专员兼黔西南绥靖区司令谭本良又在兴仁起义，接着保安部队的三个师也相继宣布起义。根据我方的命令，起义部队就地待命，等待整编。原国民党的专、县、区、乡政府一律改称解放委员会，等待接管。从此，黔西南人民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一）

我们工作团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从贵阳驱车前往兴仁。当天下午到达安顺，在安顺休整了八天。十二月二十八日，我们又从安顺起程前往兴仁。途中山脉纵横、岗峦起伏、深谷泻泉、险峰峭立、道路蜿蜒于崇山峻岭之间，汽车十分颠簸。加之缺乏汽油，乘坐的木炭汽车边走边摇，速度很慢，直到一九五〇年元月三日下午太阳偏西时才达兴仁城。当时，起义部队已接到省军区的通知，王伯勋、张涛、

王景渊、谭本良等起义将领组织有一批人员在西门外列队欢迎。进城后，我们在八十九军军部会议室（原是一个资本家的住宅）稍事休息，便安顿在专署隔壁的四川会馆内。

兴仁城周围，峻岭连绵、山石嶙峋，长满灌木和杂草。城墙还保存得完好，城楼的砖缝和瓦檐中长着稀稀疏疏的几丛杂草，这城不知建于何年代，只有那斑驳的残痕流露出岁月易逝的淡淡迹印。城内一万多人口，除了国民党军政官员、地主、商人，多数是艺人或轿夫之类的贫民。狭窄凌乱的街道只有数十家店铺，鸦片烟馆却随处可见。民房低矮破旧，阴黯潮湿。相形之下，起义部队八十九军所在的一座西式两层楼房显得格外触目。街上，不时有苗族或布依族背着黄果来城里兜售，换些盐巴或日用品。这期间，盐巴奇缺，价格昂贵。三三两两起义部队的官兵，或酗酒于市肆，或吸鸦片于烟榻，往往寻衅闹事，城内秩序显得动荡不安。对我们工作团的到来，城内贫苦人民和起义部队士兵是欢迎的。但慑地主恶霸和反动军官的势力，又不敢公开接近我们。还有一部分人则抱怀疑观望的态度。这里无电灯，晚间除了鸦片烟馆昏黯閃忽的灯光，街上一片漆黑，躺在床上听到远远近近的狼嚎，其声低沉而长，忧郁凄惨。间或还可以听到后山的虎啸，吼然一声，空谷回响，经久忧存。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团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首先是接触起义部队的上层人物。到达兴仁的第二天下午，十九兵团的将领在司令部设宴招待代表团负责人。后来谭本良又以个人的名义在原专署请代表团负责人吃饭，王伯勋、张涛也参加。借此机会，我向他们说明了来意，表示欢迎他们弃暗投明，回到人民方面来。王伯勋、谭本良、张涛等

也多次检讨自己在国民党蒋介石统治时期，有罪于国家和人民，愿意将功赎罪。工作团到达后的第三天，我们把起义部队团以上军官和县政府科级以上人员集中起来召开会议。约四、五天后，我们又在兴仁中学操场集中了起义部队十九兵团驻兴仁的官兵和部分群众召开了一次大会。通过这些会议，我们向他们宣讲全国的解放形势，宣传党对起义部队的政策，宣传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向滇、黔、川、康四省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十项通告。

其次，广泛接触起义部队的中下层官兵。我们组成了几个工作组，决定工作团的杜良儉、蔺伐夫、刘鋒、高广运、周明軒五名县团级干部各带领一个工作组到起义部队的团和县政府开展工作，宣传形势和政策，宣传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十项通告，使起义人员认清形势，坚定走弃暗投明的道路，稳定情绪。

我们到达兴仁的第二天，罗盘地委派了地委委员王綱正同志和地委委员兼边区纵队二十一团政委甘东等同志来与我们联系。次日下午两点多钟，在我们住处的小会议室里见了面。我记得王綱正同志当时戴着一顶军帽，上身穿着破破烂烂的灰制服，脚穿草鞋。随他一道来的还有六、七个中层干部。地下党的同志长期与敌人作秘密斗争，环境十分艰苦，见面时彼此都很激动，他们称南下的同志为“老大哥”。我说：“你们长期坚持地下斗争，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是有功之臣，要向你们学习。现在，我们都是在中央领导下，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我们要搞好会师，团结一致，互相配合，搞好对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地下党的同志

与敌人打过多年交道，对当地情况熟悉，有利于我们对黔西南的政治、军事等方面情况的深入了解。也使我们的力量壮大起来。我们初来兴仁时，警卫由起义部队八十九军负责。鉴于当时的形势，我们决定撤掉起义部队的警卫连，由边区纵队二十一团派出一个主力连担任工作团的警卫，并由兴义游击团政委龙树德同志亲自率领。从此，有了地下党同志的配合，我们的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

(二)

一九五〇年三月，四十九师师长兼军分区司令员汪家道同志亲自率领四十九师驻兴仁的主力追剿土匪武装叛乱。这些土匪打着“反共抗俄纵队”、“中国反共救民军”等形形色色的旗号，按纵队、大队、中队、小队的编制。他们以袭击我们工作队，拦路搶劫，发展到围攻我地委和专署所在地——兴仁城。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二日，我们获得情报，知道土匪要攻打兴仁城，当晚地委和军分区的负责人召开了会议。记得当时李一非和吕洪同志已去贵阳开会，会议由汪家道同志主持，参加会议的还有四十九师参谋长杨昆、政治部副主任张新田、侦察科长王巨胜等人。会议分析了形势，强调要稳定民心，防止内乱，并且对城内力量进行了分工：四十九师司政后机关组织干部战士坚守城外几个碉堡；三个直属连队作为机动力量待机出击；地委和专署机关的武装交通股和全体机关干部组织起来站岗放哨。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散会前，我交待了交通股股长孟继顺和常锡春等同志，要他们把譚本良、张曾复等二十余名起义部队的首领请到代表团暂住一夜，保护他们的安全，防止发生意外。

第二天天剛亮，几声清脆的枪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我刚起床，来人报告说，土匪围城了，四周山上土匪走动的身影都能清楚地看见。不一会城外枪声愈来愈紧，我立即按照预定的计划，赶到西南城楼指挥所。此时，汪家道同志正拿着望远镜观察敌情，指挥前沿同志坚守碉堡。我也用望远镜看一会。只见城西南泥堡方向的土匪人数较多，枪声很紧。顺风时听得到他们断断续续的叫嚷：“活捉×××专员！”

“活捉×××师长！”“打进兴仁城活捉××党！”气焰十分嚣张。由于我们全力阻击，土匪始终未敢进城。大约上午九点多钟，为了击退敌人的进攻，汪家道同志与我简单研究了一下敌情，决定集中力量打西南方向那股叫嚷得最凶的土匪。并派了两个连，一个连从南门正面迎敌，另一个连从北门向西南门迂后，卡住敌人。当我们的出击部队接近敌人时，汪家道同志说：“怎么样，老夏，可以动手了吧？”

“可以了！”我赞同他的意见。汪家道同志随即命令架在城楼上的两门八二迫击炮开火。“嗤嗤”、“嗤嗤”，炮弹在土匪群众中炸开了。顿时，硝烟弥漫，土匪乱成一团。隐蔽在敌阵地附近的我军两个连乘机出击。土匪遭到伤亡，纷纷溃逃，其他方向的土匪见势不妙，也逃之夭夭了。这次战斗，俘获土匪五十多名，还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

(三)

一九五一年初春，树梢已发出了新芽，但严冬的寒意尚未消退。兴仁地委和专署在兴仁城召开了全区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共有代表四百多名，会场设在兴仁中学（现一中）礼堂，会上成立了贫雇农协会（简称农会），选举了农会主

席和委员。主席是李一非，副主席是我，（夏德义），委员有各县县委书记和地直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还有贫雇农积极分子。农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贫雇农，广泛发动农民群众，废除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打倒地主恶霸，配合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清剿土匪，巩固政权。会后，各县和乡村也相继建立了农会。村有村长，农会有主席，就这样新政权在农村有了一定的基础。与此同时，地委和专署部署继续深入地开展减租、退押等工作，这就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下一步开展镇反和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准备了条件。

从一九五一年春末开始，地委搞了兴仁的杨泗屯乡、贞丰的思敬乡、安龙的普坪乡为土改试点，由李一非同志亲自掌握。地委组织部长孟广涵同志和地委土改工作队负责人孙永锡同志先后在兴仁的松柏乡蹲点。完成任务的标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敢于同地主恶霸作面对面的斗争，斗倒了地主恶霸，分了土地和浮财，培养了积极分子，健全了农会和乡、村政权。

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是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的。以土改带动镇反，以镇反保证土改的顺利进行，两者之间是互相促进的。我们坚决按照中央的政策，镇压了一批五个方面的反革命骨干分子。非如此，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就打不下去，群众就发动不起来，土地改革运动就不能顺利进行，贫苦农民就翻不了身，新生政权就无法巩固。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批准死刑的权力下放到地委。不过，地委对死刑案件的批复是十分慎重的，决不随心所欲。我们抓住两条：一是看其罪恶和民愤的大小，二是看其是否属于土改的障碍，如果成了运动的障碍，又是罪大恶极的，就坚决镇压为民除害，

以支持群众运动。如离兴仁城西三十多里有个潘家庄，庄上恶霸地主李觀文，拥有土地八十亩，城里开了几处商店，庄上六十多户人家多数是他的佃户。其人当时五十岁上下，中等偏高的个子，白净面皮，娴于辞令。他有时戴礼帽，着长衫，持手杖，表面上颇有儒雅之气，但骨子里却是个阴险狡猾的人。他有大小三个老婆，掌握着一支有六十多条枪的私人武装。他设有牢房，随意关押农民，平时外出喜欢骑马，间或乘坐小轿，后面总跟着几个挎盒子枪的保镖，李觀文是兴仁的一霸。我们工作团刚到兴仁时，他主动接近我们，还向我表示说：共产党的政策宽大，他愿意接受改造。开始，我们还对他做统战工作，向他宣传党的政策和革命的胜利形势，同他商讨有关问题，尽量争取他。可是，随着形势的深入发展，触及他个人利益时，他就与我们背道而驰。在减租退押中，他采取种种手法抵制，对新生政权极为不满。由于这样，土改运动开始时，兴仁的农民不敢动，有的乡分了地主的浮财，农民不敢要。尤其是潘家庄农民不敢公开起来斗争。不久，当我们向李觀文提出整编他的武装时，他暗下埋藏武器，分散武装人员，拒不接受改编。最后他翻脸不认人，露出了地主恶霸的本来面目，策划拉出武装上山与我为敌。一些贫雇农向我们揭发了他的阴谋，经过查证核实，一天下午，地委派兴仁县公安局李金玉带人把他抓起来了。为了支持群众运动，我们先在内部统一了地、县委领导的认识，並请示省委，决定把他镇压掉。一九五一年秋，在一个晴朗的下午，我们在兴仁东门外的大操场召开了公判李觀文等十余名地主霸恶和反革命分子的大会。方圆几十里的人都赶来参加，将近一万多人。会上，我代表兴仁地委和专

署讲了話，表示支持群众运动，坚决镇压反革命。接着，兴仁县公安局李金玉同志根据他们罪行一一作了宣判，将大多数罪犯就地枪决了，随即又将李觀文押至潘家庄当众枪决了。对此，人心大快。世世代代受尽压迫和剥削的“穷人”激动得流出了眼泪。他们情不自禁地挥起拳头，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落，气氛非常热烈。从而打掉了地主阶级的威风，给贫雇农撑了腰，壮了胆。此后，广大农民紛紛起来和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揭发他们的罪行，有力地推动了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

（注：此文摘自《黔西南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中《解放黔西南建立新政权》一文有关兴仁情况的部分资料。）

忆在兴仁专区率部起义

王伯勋

口述

王贵屏

整理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下旬，我受令赴盘县时率一个无线电班，还有一个警卫连。因天寒地冻，行军艰难，路途耽误的时间太长，到达盘县时，谷正伦已于前一天走了。韩文煥当晚准备为我接风。我因在途中确已吃过晚饭，又见他们忙于准备行装，没有与我们及时交谈就借行军太疲乏，需要早休息而回住处去了。

回到住房不久，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张法乾打来电话，他说：“谷、韩想叫你戴‘赖壳帽’，我看你戴上有好处”。李厚如（交通局长）接过电话插话说：“伯勋，戴上好，关键时刻起作用”。我认为在电话里不便向他们表态，只作了一般性的问候。

不一会，又接张涛打来的电话，他也说：“可能会叫你戴‘赖壳帽’，你就接过来戴上，然后再商量”。我的确是太疲劳了，一觉睡到天亮。等醒来时，韩文煥、张法乾都走了。

当时，驻盘县的是余啓佑的保安队编成的二七二师。我立即约余啓佑来见面，我说：“该走的都走了，我不会丢掉十九兵团的官兵不管，也决不向任何兄弟部队放枪，你把队

伍带好，有事我们共同商量”。余啓佑当天还杀了两头猪，送了好些肉请我们带回去给其它人员吃。

又过一天，张涛叫三二八师副师长王光炜来接我去普安。一坐下我就对张涛说：“文渊（张涛号），你讲的‘赖壳帽’是指什么？”张说：“你装不懂，我就不说了”。我又说：“你不想说，接我来做什么呢？”张说：“谷、何、韩都走光了，这‘赖壳帽’你不戴也得戴。凡事总得有个人承头。现在各股势力中都有你的好友，加之你回贵州不久，对誰都无积怨，大家齐心就可以成大事，贵州的老百姓就少遭殃”。我说：“你的意思是联合起来学陈明仁啊”；张涛高兴地站起来说：“正是这样”；我说：“这真叫做不謀而合”。我又说：“要是保安部队的刘鹤鸣（黔西北綏靖区司令）和谭本良（黔西南綏靖区司令）也赞同我们的做法，此举就成功无疑了。张涛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将请他们前来共同商议”我又向张说：“看你信心这么足，与解放军联系上了吗？”张很坦率地说：“解放军一进贵阳，我就通过龚鍵其与他们接上了关系，现在连电台的呼号也有了”。我说：“这太好了。龚鍵其先生在嗎？是否能介绍我认识”？张即将龚鍵其请出来与我见面。我向龚談了我与王景渊准备起义的想法。龚很誠恳地说：“人民解放军五兵团杨勇司令员、苏政华政委已表示欢迎各位将军能联合起义，现在最好能把有关人员请到普安来共同商议”。

张涛约请谭本良、刘鹤鸣到普安后，直截了当地談了我们决心起义的想法。谭、刘二人都认为：从整个形势看，谷、何、韩已弃众而逃，我们若还坚持打，已毫无意义，只有走和平解放之路才能顺应民心。我也立即通知王景渊速到普

安，紧接着成立了联合起义的五人核心小组，即王伯勋、王景渊、张涛、谭本良、刘鹤鸣。並议定：凡属保安部队和地方势力，主要由谭本良和刘鹤鸣做工作。十九兵团的官兵由王伯勋、王景渊、张涛分别做工作。张涛说：“八十九军团以上军官他已做好了工作，都同意起义。目前，最难办的是駐盘县的保安二七二师师长余啓佑的工作难做；他布防的位子很重要，我想用武力强制他起义。”王景渊说：“强制不行，弄不好会双方开枪，军心就大乱了，联合起义就会受到影响。我自願去当说客，当人质，说服余啓佑共同起义。”大家同意王景渊的意见，並由张涛派一个团去给王景渊作后盾。

经王景渊一天多时间的耐心说服，余啓佑终于同意起义了，並与王景渊同到普安，在通电起义稿上签了名。

因张涛已事先拟好了八十九军团以上干部起义通电稿，我和王景渊、谭本良、刘鹤鸣则共同拟一份率部起义的通电稿。

十二月初的一天，我们商定派三二八师付师长王光炜代表所有起义部队，向贵阳军管会赵健民主任汇报起义经过，並面交了起义通电。赵健民主任说：“对諸位将军率队起义，我们热烈欢迎，但通电何时发表，需请示上级研究后再定时间。”

王光炜回来不久，接贵阳军管会来电，内容大意是：①希八十九军张军长尽量征集运输汽车于日内集中，交解放军部队备用。②駐晴隆、普安、盘县沿公路的起义各部即日移住兴仁，並维持地方治安。此两项务必均于十二月八日完成。起义各部迅速遵照电报要求行动。

我们在普安酝酿草拟通电起义稿的日子里，接蒋介石国防部电报两份。一份主要是任命：升任王伯勋为十九兵团司令，升任王景渊为十九兵团副司令，升任张涛为八十九军军长。另一份是命令十九兵团星夜开赴云南，统一指挥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攻占昆明，讨伐准备起义的卢汉。将他扣押的李弥和余程万救出来。这两份电文同样发给第八军和二十六军。致使该两军认为十九兵团即将入云南。他们向昆明发起猛攻，蒋又派飞机配合轰炸。卢汉迫于压力，只得将李弥和余程万放了。驻曲靖的陆军总司令汤焘一日数电，催十九兵团速往。

对蒋介石发来的这两份电报，我和王景渊、张涛都不予理采。我们一致认为，既已决定起义，就不再受蒋介石的任何任命和命令。我不要兵团司令的头衔，王景渊也不要兵团副司令的头衔。至于张涛的军长职务，是谷正伦杀刘伯龙后就委任的，早已行使军长职责。因此，在起义通电稿上，我是十九兵团副司令，王景渊是四十九军军长，张涛是八十九军军长。我窥测王景渊的想法，认为他看得清楚。因为在此关键时刻，要做成大事，一定要少考虑个人，才能团结大家，否则，就会为这个副司令头衔而影响联合起义。

贵州的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保安部队，能联合起来共同走和平解放之路，王伯勋、王景渊、谭本良、刘鹤鸣以及所有志同道合的军官都做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尤以张涛更是主动积极。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联合起义就难于实现。

十二月十日，王伯勋、王景渊、张涛、谭本良、刘鹤鸣等率部起义的通电发表了，蒋介石得知后慌了手脚，急命驻守云南的第八军和二十六军集中开远机场，迅速空运台

湾。二十六军刚运完，开远机场即被广西进入云南的解放军攻占；李弥的第八军空运不及，只得经滇南逃往缅甸。解放贵州的人民解放军，沿滇黔公路用汽车输送，突然进入云南曲靖，陆军总司令汤埏被俘、卢汉宣布云南和平解放。

在国民党军十九兵团及其所辖的四十九军、八十九军和贵州黔西北、黔西南两个绥靖区的部队联合起义的影响下，贵州其他地区有的专员、县长也相继起义。

自行撤出鸭池河防线的陈德明二七五师，脱离四十九军后，是在金沙安底起义的。

当人民解放军快到沾益时，我和王景洲立即电告在沾益的十九兵团高参林干夫和四十九军参四科科长贺良佐，将十九兵团和四十九军在沾益的物资交人民解放军接收。

十二月下旬，各起义将领到贵阳省军管会报到。我先回安龙将父母、岳母和姪女接到兴仁，然后才一同赴筑。

到贵阳后，眼见社会秩序井然，花溪家中平安无事，我的三个孩子都在花溪念书，深深感到共产党领导有方，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因而得到全国人民拥护。

我们参加起义的诸将领回到贵阳后，受到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杨勇司令员和苏政华政委的热烈欢迎，并设宴款待我们，宾主畅谈，气氛融洽。我的切身体会是：共产党对有诚意合作的人是真诚相待的。

注：摘自《安龙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王伯勋回忆录专辑，文中略有修改。）

回忆谭本良起义事略

譚 百 周

先叔谭本良，字俊明。一九四九年他遵照地下党贵州省工委旨意，毅然赴任贵州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经过十个月的努力，历尽艰险，于十二月十九日起义成功。使黔西南地区得以和平解放，广大人民免遭战火之灾，国家邮电、公路、桥梁、文书档案得到完整保存。实现了他多年报效国家，造福桑梓夙愿。

一九二〇年他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历任黔军排、连、营、团长，一九二九年任国民党整编第十师旅长兼团长。八十五师团长。一九三六年入南京陆军大学特三期学习，三八年毕业调任十四军参谋长，一九四一年任八十九师师长，一九四二年复任十四军参谋长，一九四八年任八十五师师长。先叔戎马数十年，烟酒不沾，不阿不谀。一生光明磊落，廉洁奉公，从不居功自持，甘愿默默无闻，虚怀若谷，待人以诚，事必躬亲，任劳任怨。凡他所在部队，严禁扰民，有奸污妇女、吸毒，乃至偷摘群众瓜果者，不论官兵，一经发觉，立即严惩。

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前夕，地下党组织获悉十四军奉调徐蚌会战，争得家叔娘邓元卿同意，以叔娘生病住院为由，电催先叔返渝，由地下党张立同志共商率部起义事宜，

时先叔任十四军八十五师师长，对该师将佐相处有年，多系多年交往，有一定情谊。但在十数万军队中率部起义不是轻而易举之事，所以，开始思想有些犹豫，说必须慎重计议，以防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虽经多次商讨无一个头绪，后张立、先叔和家叔娘选择了比较清静的大梁子青年会“江山一覽”茶亭作了一次长时间的商谈，研究了如何组织起义和与解放军联系的方法等，从而统一了组织，准备及时返部。因一时未购到飞机票，贻误时机，部队已提前开拔。到南京报到后返渝，赋闲在家。

张立同志，原名张芳，在重庆时化名张佑铭，同系普安县人。三十年代初，谋事于先叔。他勤奋好学，思想进步，深得先叔器重，在团部先任文书，后提任军需官。一九三六年应地下党员刘茂隆、陈礼元（普安县人）相邀到南京，由先叔出资四百元开设“平平书店”，因出售进步书籍，一九三七年二月被查封，逮捕。先叔力保出狱，并资助奔赴延安学习。一九三八年返普安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宣传抗日救国。时先叔陆大毕业回乡省亲，他们邂逅相遇，形影不离。普安县长车祖淦等官员和地方士绅相继来访，或交谈、或赴宴，张立均相陪参加。先叔对张的敬重，给当时的地下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四军调防重庆，先叔兼任重庆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张立亦在重庆活动，客居舍三楼（公园路一号），他的一切活动受到了直接保护。由于频繁接触，马列主义的宣传对先叔的思想影响亦很大。一九四五年部队调河南，仍继续由家叔娘邓元卿负责联络、掩护。一九四六年我在盘县高中毕业返渝，和张立同住三楼一个卧室，三月我考入重大先修班，为便于和张人均同志传递信息（当时叫张